

二十年與十年

● 高申鵬

傅高義對於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始於他對當代廣東的關注。三十年前中國在廣東率先一步進行改革開放時，曾把廣東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而外部世界早就將其視為觀察中國內部情況和變化的視窗。



傅高義 (Ezra F. Vogel) 著，高申鵬譯：《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 (1949-1968)》(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哈佛大學的傅高義 (Ezra F. Vogel) 教授是當今美國著名的東亞問題專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對當代中國和日本都有深刻而持久的觀察與研究。傅先生不僅學識深厚淵博，而且廣結善

緣、長袖善舞，加上哈佛大學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他對當代中、美、日之間的國際政治關係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在中國和日本都享有很高的聲望。

傅高義對於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始於他對當代廣東的關注。作為美國最有名望的中國通之一，他首先是一個廣東通。廣東是南中國的門戶，三十年前中國在廣東率先一步進行改革開放時，曾把廣東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而外部世界早就將其視為觀察中國內部情況和變化的視窗。傅高義最重要的兩本中國問題研究著作，都是關於當代廣東的：一本是《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 (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以下簡稱《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引用只註頁碼)，這是西方世界對當代中國進行區域性研究的一部開拓性的著作；另一本是《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以下簡稱《先行一步》)。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描述、分析了新中國建國後廣東最初的二十年，一種新型社會主義秩序的建立和人民對這種新制度的適應；《先行一步》討論廣東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8），廣東領先一步，在中國的改革中取得試驗性的成功，以及對全國其他地方的示範性意義，同時也向西方世界展示在中國發生的全新變化。一個外國學者就中國一個省份相繼出版了兩部著作是很少見的。從時序上講，這兩部著作是當代廣東歷史的生動再現；而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它們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制度轉型。一個二十年、一個十年，基本勾畫了新中國歷史上兩種迥然不同的制度格局。

作為國共內戰的遺產之一，中美之間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處於敵對和隔絕的狀態。雖是如此，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將長久存在已是一個事實，美國需要了解中國內部的真實情況和變化趨向，需要着手開展對當代中國的研究。1955年底，哈佛大學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前身），領導這項工作的是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傅高義當時是哈佛年輕學者中的翹楚，他在日本研究上的成績顯示出其研究才幹，並因此受到器重。1972年，他繼費正清出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1960年代初，傅高義的學術興趣開始轉向中國問題。為了研究上的便利，他選擇了廣東作為研究對象。他在香港隔岸而觀，收集書籍、報刊資料，與從廣東到香港的

人進行訪談。他通讀了到1960年代末廣東出版的《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以及廣東省委出版的雜誌《上游》等。傅高義雖然不能到廣東進行實地考察，但已經非常貼近廣東。憑藉良好的學術訓練和敏銳的分析能力，他可以真切感受到廣東和中國的變化。

1969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了傅高義的《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該書副標題標示的年份是從1949到1968年。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完整的時代（距離這個時代的結束還有十年，需要由他後來的《先行一步》作結），但並不妨礙作者抽取這一時段進行分析。傅高義的分析處理方法是將這一時段分為建立新秩序和適應新秩序；這個新秩序就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這部著作的主題。從1949到1968年的二十年間，中國經歷一系列深刻激烈的政治運動。從土改、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公社化、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的領袖相信社會主義必將為中國帶來一個嶄新而光明的前途和一個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

在傅高義的這本書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對共產黨在新中國建立之初所開創的新的局面是肯定的。他認為共產黨給這個百多年來落後、貧困、飽受欺侮、歷經磨難的國家帶來了秩序、朝氣、希望和自信，還有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激情。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以弱勝強，由小變大，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大國。黨自身充滿信心，人民對黨也充分

《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副標題標示的年份是從1949到1968年。傅高義的分析處理方法是將這一時段分為建立新秩序和適應新秩序；這個新秩序就是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是這部著作的主題。

建國後的二十年中，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展開和完成，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勉強做到的。傅高義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廣東的政策還算是比較務實和溫和的。

信任。黨決心致力改變過去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創造一個新社會。黨給人民帶來了實際的好處。

以廣州為例，過去繁榮的黑市、飆升的通脹結束了，賭博、賣淫、鴉片消失了；普通民眾可以有一個安全、和平的生活環境，官員有一種服務意識和紀律意識，為人民服務是政府公共道德的基調。經濟領域統一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它使專業領域的工作更為協調，為工業產品的標準化鋪平了道路；在農村，個人耕作的結束和新的管理方式有利於根據土地的狀況和對農產品的需求作出更合理的安排，新的品種和技術可以更有效地推廣傳播，便利開展整修道路、建設灌溉工程、開墾土地等等。在經濟事務之外，集體合作組織在消滅文盲、推廣公共衛生等活動中也可以發揮相當大的作用。黨通過政治組織實現了相當大的經濟上的進步。

另一方面，在這二十年中，黨建立了強大的政治體系控制社會、改造社會，重要的經濟、文化、教育、農村活動都置於政府的管理之下。政治指揮經濟，使經濟事務牢牢地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政治決定取代了市場機制，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社會主義改造的迅速展開和完成，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勉強做到的。土改中剛剛得到土地的農民對於被集體化，有被重新剝奪的感覺；少數膽大的農民不滿意被集體化鬧退社，結果是受到羞辱和懲罰，多數人聽從安排但失去了熱

情。城市中的有產者敲鑼打鼓「報喜」，慶祝自己登上了社會主義的列車，但這並不是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意識形態上的壓力使人們不敢表達真實的要求和意願。

雖然以集體化的政治安排取代市場機制的本意是改善生產關係和創造更大的生產力，但實際上卻造成了僵化、混亂、低效率和嚴重的物質短缺。1962年春夏間，在向稱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冒着生命危險偷渡到資本主義的香港，足以說明當時情況的嚴重。儘管如此，傅高義認為，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大多數情況下廣東的政策還算是比較務實和溫和的，廣東的領導人總是力圖將各個政治運動和促進經濟生產聯繫在一起。

總的來看，在這二十年中，人民生活的根本變化不是來自經濟上的變化，而是來自政治組織的變化。這麼多年的發展中，廣東的職業結構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絕大多數人還是從事農業；在城市，市民生活的變化，不是由於技術的發展，更多是由於秩序的重建。合作化組織並沒有創造出更好的生產關係，沒能如所設想和所期望的那樣迅速提高糧食產量。大躍進的失敗，幾乎危及到政府執政的威信和合法性。面對當時實際的政策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困難，政策一度有所鬆動和調整，允許市場有一絲微小的空間，以紓緩迫切的困難，但總的趨勢是加強控制和計劃，強調當時所定義的社會主義的正確性，以及市場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對立性。

一直到文革，以大規模的群眾政治運動摧垮務實政策和主張務實的領導人，竭力維護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傅高義的結論是：「最後，經濟結構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不得不回到他們不滿意的生活狀態。政治復興主義〔指文革〕不過是暫時的，因為它缺少經濟、政治的基礎來支持它。」（頁331）這其中已經包含了不得不進行變革的理由。

這是傅高義1969年的結論。可惜當時中國專心忙於各種政治運動，忽視了外部世界對自身的看法和聲音。直到十年後中國才重新作出了選擇。中國後來的變化證實了他當時的判斷。

由於廣東的特殊性，這本書還有一個次一級的主題：廣東的地方主義問題。通常，中國歷史上地方勢力的崛起是在中央政府力量衰微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和當時新政權剛剛建立的情況迥然不同。在1950至1953年的土改運動中，廣東地方的領導考慮到廣東的情況和北方有所不同，廣東的大地主很少，小地主多是工商業者（建國初期，為了經濟穩定，對工商業者的政策相對寬容），一些地主的土地是在海外的華僑親戚的經濟支持下獲得的；在游擊隊時代，一些地主曾幫助過共產黨的地方武裝，黨對這些人也有所承諾。因而，他們主張兼顧廣東實際情況，採取溫和的土改政策。隨着全國範圍的解放，抵抗共產黨的力量迅速消解，中央政府曾同意在後解放區執行較為溫和的土改政策。

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這一局面，中央要求廣東執行嚴厲強硬的土改政策，於是，對於政策不同程度的理解把握，上升到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在土改運動中，廣東本地的幹部不太被信任，80%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本地幹部被南下的北方幹部取代（頁110），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東一直潛伏着地方主義的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以後在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有所表達。

傅高義是社會學家。1960年代末，他對廣東研究的旨趣不是書寫歷史，而是關注現實。四十多年的時間流逝了，他的作品本身成了歷史，同時也成了很好的歷史作品。雖然，社會科學不能算是精確的科學，但獨立的研究和價值中立的學術立場，確有其科學性和洞見真實的價值。

傅高義的作品是在中美隔絕的冷戰時代完成的，但他超越了冷戰思維。傅高義後來曾說過，他不可能像斯諾（Edgar Snow）、艾黎（Rewi Alley）那樣，只報導中國的積極面，也應該說明他所了解的消極面。這是一個學者應該有的求實和求真的立場。

1970年代末，廣東的特殊性使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驅，也標誌着中國社會的轉型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啟。傅高義再一次將目光投向率先進行改革開放的廣東。1989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又推出了他另一本關於廣東的著作：《先行一步》。這

傅高義關於廣東的兩本著作，一個二十年，一個十年；一個建設、鞏固，一個變革、開放。所講述的廣東在不同時代的故事，在邏輯上耐人尋味：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社會主義回到「初級階段」。

本書出版不久隨即有了中文譯本，引起注目多時。

傅高義關於廣東的兩本著作，一個二十年，一個十年；一個建設、鞏固，一個變革、開放。時代不同了，主題也不相同。這兩部著作所講述的廣東在不同時代的故事，在邏輯上有耐人尋味之處：時代在進步，而歷史有時或許會「後

退」，退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社會主義回到「初級階段」。這四個時下不常被提起、幾乎被忘卻的字，至少和「改革開放」四個字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它是過去幾十年慘痛教訓的總結，同時也是在既定的條件下為後來的社會的變革和開放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據。

知識份子問題研究的新典範

● 茆大祥、楊豔中

李著通過一個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個案，對1950年代知識份子思想批判的主要事件的發生原因、過程及其歷史影響作了縝密的考證，進而為似乎是偶然發生的歷史「個案」彰顯出歷史現象背後的內在邏輯。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 (1949-1959)》(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如何改造、團結、利用知識份子，一直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無法迴避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而圍繞這一問題的歷史研究，自1990年代以來，日益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之一。但綜觀這些成果，在史料的發掘、理論深度，以及必要的客觀研究態度等方面還存在着一些遺憾。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了衡量歷史學進步與否的三個標準：「(一)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 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